

奥数这“海盗”为何越剿越猖狂

核心提示

最近只要有小学生的北京家长谈起奥数,几乎无不痛恨,其中的苦楚似乎难以用语言来表达。可问起小学生,居然是几乎人人都在上,当然极少听说哪个孩子真正喜欢。青少年问题研究专家孙云晓先生的一句“狠”话这么说:“奥数是一个让大部分孩子一次次证明自己是傻瓜的课程。”既然孩子不喜欢,家长也痛恨,可为什么教师、家长还要让孩子去证明自己是傻瓜呢?

小学不开奥数课 家长群起而攻之

当了十几年校长的北京史家胡同小学校长卓立,最近也因为学校不开奥数课程受到了家长的“攻击”。每一新学期开始,史家胡同小学都会进行一次网上家长会,今年也不例外。可是在网上,有家长匿名提问:“现在别的小学都在开奥数课,史家为什么不开?”也有言辞激烈的:“看看这次奥数比赛的成绩,史家太落后了!这说明学校的教学有问题!”

史家胡同小学是北京市的重点小学,在家长中口碑甚好。对于“太落后”这样的“攻击”,卓立校长非常无奈:“我一向的观点是,奥数本身是很好,可以锻炼孩子思维,但一些孩子如果连数学都不及格的话,去学奥数是没有意义的。其实有些是家长的虚荣心在作怪。孩子在里面学得很苦恼,即便学下来也只是给别人当父母,要知道真正能够凭奥数成绩去上好中学的孩子只是凤毛麟角。”

“奥数”是奥林匹克数学竞赛的简称,作为一项国际性赛事,由国际数学教育专家命题,出题范围超出了国家义务教育的课程标准。但是因为北京市小升初取消考试,初中学校在电脑派位之外选拔学生的一个依据就是“奥数”成绩,有的中学自己暗中组织的入学考试中也有奥数题目的影子,使得奥数大行其道。

作为北京市政协委员,卓立曾经连续两年的提案,都是要求有关部门规范泛滥的奥数班。北京市曾经于2005年叫停过各类奥数辅导班和竞赛。但是在叫停一段时间后,一方面

大多数家长仍把奥数当作进入重点初中的惟一稻草,纷纷私下给孩子找老师、做训练;另一方面,一些老师也在暗中开课。奥数很快卷土重来,而且比上一轮更加严重。不光是各种课外培训机构大发奥数财,连一些小学也在校内加入了奥数课程。如此怪象在不断加剧:家长恨奥数、院士批奥数、学生怕奥数、舆论骂奥数,但好像无论如何谴责都不足以灭掉奥数这个夺去了许多孩子快乐童年的“海盗”威风。

无本万利的奥数经济 煽动家长掏出血汗钱

对于奥数的兴而不衰,很多人这样解释,因为北京小升初看似不考试,但是许多中学在选拔生源时,奥数成绩是其中一个重要的参考依据。其实,在某种程度上这只是一个堂而皇之的借口,更深层次的原因还要归之为巨大的利益驱动。

媒体曾经报道过,一位在北京市做了近十年的奥数教练坦言:“一个奥数,带出的是‘奥数经济’啊。”他估算奥数培训市场有接近两亿元的规模。这还只是前几年的数字。如今小

学生几乎是人人奔奥数,那么这个数字如果能算出来的话,会更让人惊叹了。

就像索马里海盗,若是单独行动没有什么优势,但是一旦形成帮派团队,就会猖獗无度。有专家甚至不客气地说:“现在奥数培训班已经与一些中学结成利益共同体”既然能够像海盗一样无本万利,奥数班自然会加大宣传,用到名校“占坑”的前景绑架孩子引家长掏出血汗钱。

打破利益共同体 让奥数没有生存之地

“我建议像打击黄赌毒那样,严禁打击小学生的奥数训练,这个东西无论从教育规律上还是实践中,已经有非常确定的证明对于培养人的数学思维没有任何好处,是一个数学杂技,是一个毒品,是少数人盈利的工具。”3月25日,21世纪教育研究院院长杨东平教授言辞激烈,他认为现在各种名校办的奥数,都是变相内外勾结,有的老师在课堂上有意出奥数题,小学生解不出来,老师就会告诉学生你到哪里去学。这些名校老师下课了就到奥数班去上课。

有人可能会说家长盲从,但是在教育资源

均衡还没有实现的情况下,一些示范校、重点学校占据了绝对的教育资源,面对一个孩子,大多数家长不可能不超脱。打击这些海盗,打破利益共同体,需要政府以及具体的教育管理部门的行政介入和监管。如果对这种现象不闻不问,甚至暗地里内外勾结,推波助澜,可以说是学校失德、政府失职。

21世纪教育研究院前段时间公布的教育满意度,济南各项指标均列第一,原因就是教育主管部门的监管起到了作用。规定不能加课、不能办课外班,有人不听,违反禁令,那好,就通报批评。再发现,就进行严厉处罚。2008年,共有3个城市和10所学校被通报。

对于教育乱象,行政监管的力度由此看到,效果由此显现。

在不断调整尝试,逐步击碎制度瓶颈,力促教育资源均衡的前提下,打破利益共同体,奥数这个强盗自然就没有生存之地了!其实家长和学生在小学阶段的追求并不算多。哪个家长不愿意看到自己的孩子能有充足的时间在阳光下自由地奔跑?他们只是希望在不能完全改变目前应试教育的局面下,最起码别让大科学家考虑的数学问题难为小学生!

据《中国青年报》



核心提示

国家统计局近日公布了2008年全国城镇单位在岗职工平均工资为29229元,日平均工资达到111.99元。与2007年相比,年平均工资增加了4297元,增幅达到了17.2%,扣除物价因素,实际增长11.0%。而其中平均工资最高的是机关,为33869元,是全国平均水平的1.16倍;最低的是企业,为28359元,是全国平均水平的97.0%。从行业间工资分布看,平均工资最高的行业是证券业172123元,是全国平均水平的5.9倍。最低的是农副食品加工业17559元,只有全国平均水平的60.1%。

数据的公布招致广大网友的热议与质疑,平均工资的真实性和行业收

入悬殊一时间成为技术统计“不能承受之重”。在近年来公司高管千万年薪、电信等垄断行业的天价收入以及某些政府官员公款出国旅游等等舆论背景之下,普通民众的眼球再次被平均工资灼伤。

透过争议反映出的日益拉大的收入悬殊及其对于贫富分化的社会焦虑。是什么导致了“平均工资”不平均?收入的悬殊带来哪些社会问题?现行的收入分配制度是否公平合理?在构建和谐社会的语境下,这些问题值得我们深思。

“谁平均了我的工资?”

国家统计局关于2008年城镇在

“平均工资”的不能承受之重

岗职工平均工资数据发布后,在某知名网站的论坛里立即引来上万条跟贴。一张转贴率极高的帖子“张三家财一千万,九个邻居穷光蛋,平均起来算一算,个个身上上百万”,以幽默调侃的语气表达出对收入差距现状的不满与无奈。

有网友说:“给国家拖后腿了,俺的工资不及平均工资的一半,俺听说很多地方的工资和俺的工资差不多!”

有位网友不无担心地说:“这样的统计不如不发,会让人心理失去平衡,不利于工作,我们单位每个月工资才1000多,发这样的统计报告,能让我们心理舒服吗?”

还有网友认为“根据现行统计制度,城镇单位在岗职工工资统计范围包括国有单位、城镇集体单位,以及联营经济、股份制经济、外商投资经济、港澳台投资经济单位,尚未包括城镇的私营企业和个体工商户。为什么不包括?何时包括?”

面对快速增长的平均工资统计数字,公众本应显现的高兴热烈却被种种质疑与不满所替代。“谁平均了我的工资?”可以看出,平均工资统计数字令公众心生疑窦的原因除了统计口径问题,主要在于这样的“平均”客观上掩盖了当前收入分配差距的真实情况。

11:1的差距是怎样形成的

国家统计局的报告分析最高与最低行业平均工资之比为11:1。在行业与行业之间,不同单位之间,单位的不同岗位之间收入差距加大已是一个客观现实。不可否认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按劳分配为主体的分配方式逐渐转变为按生产要素进行分配,一部分人依靠智力与勤奋赢得了发展的先机,这部分人先富起来,他们的财富不仅为社会积累了财富,同时也带来了积极的示范效应。这样的财富积累自然无可厚非。譬如“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在被传出坐拥六七辆私家车的新闻后,却得到网上网下几乎众口一词的支持,甚至有网友坦言:“袁隆平爷爷配飞机都不过分。”

但是,由于行政垄断、权力寻租、分配制度不公、城乡区域差别导致的收入差距依然在一定程度内以一种常态形式存在,而正是由于这些因素导致的收入悬殊使得社会公平的天平失衡,造成对社会公平的极大损害,为社会公众所诟病。

在当前的市场经济条件下,权力垄断和资源垄断造就了一批“金饭碗”,由于占据先天的“行业优势”,一些人可以少劳多得,甚至可以不劳多得。某些国有企业的高管拿着与国际接轨的天价薪酬,却无需承担相应的

企业利润下滑的经济责任。

与此同时,由于缺乏透明与监督,一些政府部门个人消费与公共开支混淆,公款按摩、公款出国旅游等现象屡见不鲜,权钱交易、灰色收入、国有资产流失使得一些人一夜暴富,加剧了财富分配的差距。

此外,城乡二元经济的体制壁垒导致了就业、择业的发展和机会的区别也拉大了城乡居民收入的距离。与城市居民相比,农民工虽然为城市的GDP贡献了汗水与心血,然而依然不能享受平等的社会保障与公共产品服务。

如何缩小贫富差距

“发展和改革的最终目的是让广大群众受益,发展和改革的成果要让全体人民分享。”这是社会主义改革与发展的宗旨。随着国家经济实力的增强,普通民众欣喜地感觉到自己的收入在逐年递增,家庭的财产性收入在增加,然而与此同时不可忽视,不同行业,不同阶层人民收入之间差距正在加大,社会贫富分化加剧。

据中国新闻网发布的消息称,2008年中国内地个人持有可投资资产超过1000万人民币的高净值人群约30万人,共持有8.8万亿人民币的可投资资产。估计至今年底,中国高净值人群将达到32万人。也就是说占13亿人口的0.023%的人

占据了国民财富总值的1/3。

这种财富分配的天壤之别带来的是社会层面的巨大分化,削弱了人们的幸福感,易引发社会的仇富心理,从而成为社会不稳定的潜在诱发因素,最终影响社会的和谐发展。

缩小贫富差距首先要重视机会的公平。市场经济是竞争经济,在资源有限的情况下,为存在客观差异的社会个体或群体提供生存与发展的公平的初始条件,解决起点不公平问题,让不同条件的人站在同一起跑线上,实现“公平”这一现代社会的核心价值。

缩短贫富差距还应打破行政垄断,制止权力寻租冲动。以合理的制度设计切断垄断利益链条,遏制不合理的垄断利润。

缩短贫富收入差距,政府要致力于改善低收入者的生存质量,提高低收入群体的收入。为低收入者创造学习、发展的机会,同时完善社会保障体系,改善低收入者的生活质量。在二次分配领域,完善税收征收制度,发挥税收的调节收入差距功能。

人们对于平均工资统计数据的种种质疑与非议,实质上指向的是社会公平缺失。只有依靠政策层面的科学调整与完善,才能实现国民收入的分配新格局,从而使“让人民共享改革成果”不至于成为一句空话。

据新华社

新闻时评

放弃高考 放弃了什么

前两天中国农业大学的校长还说,大学应届毕业生就业难源于其素质下降。果不其然,活生生的事实例证很快出现——据重庆市招生自考办公室的统计,今年重庆有上万名高中毕业生放弃高考,其中有不少来自农村学校。当前高职、大专院校毕业生“就业难,收入低”是农村学生弃考的重要原因之一。(新华社4月19日)

当年高考“千军万马争过独木桥”的盛况,看似被越来越激烈的大学扩招势头所稀释和淡化,但来自学生之间的内部竞争态势并未真正缓和。比如,进入国内相对知名(未必是真正一流)大学的门槛依旧高企,北京上海等大城市学生与中西部学生之间的录取分数线之悬殊,决定了双方完全不是站在一个公平的起跑线上;农村学生相对城市学生在教育设施、师资等资源配备上的先天不足,再加上录取分数线与报考人数的差异化,使得前者进入大学的努力依旧可能是后者的十倍。即使进入大学,农村学生面临的高昂学费、就业压力,成为其所背负的沉重负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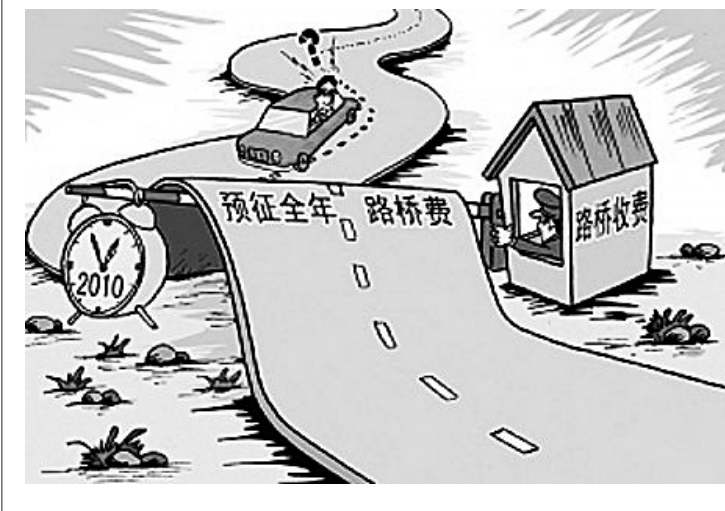
因此,“万人放弃高考”中农村学生比例较高,成为可以理解的现实抉择。与传统的分数达不到录取分数线的无奈放弃,学校出于录取率利益考量的自动分流不同,不少农村学生即使规避了以上难题,依然要冒着“辛辛苦苦读进大学,全家攒钱供上大学,上完大学无处就业”的巨大风险,这风险成为压倒其希望的最后一根稻草。

显然,“万人放弃高考”不仅放弃了一次求学机会,更放弃了“教育改变人生”的信念。长久以来,“学而优则仕”的庙堂传统,以及更朴素的“鲤鱼跳龙门”的直观表达,反映出教育在国人心目中的尊崇地位,是追求知识的本真与改变生存位置的现实价值相结合,正所谓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直接催生了人们为高考努力拼搏生生不息的进取动力。

但日渐让人喘不过气来的学费负重、日益激烈的求职竞争以及所谓大学生“从精英到民工”的身份落差,使得“教育改变人生”的金字招牌失去了成色。更重要的是,正如报道中所指出,农村教育受限于二元制歧视下的资源匮乏,让农村学生学习成绩难以提高,综合素质难以完善,并且在求职过程中还处处落后于城市学生所享有的人脉关系、机会成本。

“万人放弃高考”其实是学生们从经济人的理性本能出发,做出的自然抉择。这情景直接对教育公共伦理的文化基础提出了挑战:如果再不建设尊重知识本质、符合现代社会发展规律、贯彻素质教育理念的教育文化和内部治理,再不重新审视被长期荒废的农村教育体系,再不对农村家长与学生有凝聚力、吸引力的教育氛围,再不对形形色色诸如“拒绝招聘农村户口学生”的制度歧视予以革除,类似的时代倒流趋势就会逆向强化,我们将听闻更多的“万人放弃高考”现实。 晓杨

漫画:预征路桥费



在没有任何批复和授权的情况下,兰州市收费部门先行一步,开始“预征”2010年全年的路桥费。兰州市建委和路桥费收费管理处坦承,工作有失误,因为“坚信”路桥费不会取消,就提前预收了(4月19日《工人日报》)。

批复授权都没拿,寅收卯费成妙法。工作失误挡箭牌,国家决策成虚话。预谋才是真想法,坚信二字笑掉牙。权力变现急吼吼,趁早辞职谢天下。

刘道伟 漫画 李军 配诗

黄光裕案 是官商勾结更高阶段

据报道,中央纪委、中央组织部有关负责人证实,广东省政协主席陈绍基、浙江省纪委书记王华元涉嫌严重违纪。初步信息显示,两人案发均为受黄光裕、郑少东系列案件的牵连。

从仰融到杨斌,从赖昌星到陈凯,从“顶风扩张”的戴国芳到金融大盗国洪起,再到金融大鳄冯明昌,资本以巨额贿赂打通权贵之门,又以国家资本制造“亿万富翁”的品牌。于是,每个富豪落马都会卷起巨大的漩涡,吞噬掉许多高官。这已成为一种规律。与其说这是资本的原罪,莫如说是权力的贪腐天性借助资本得以极大地张扬。这亦正是吴思先生所指出的,中国并不存在一个资本和资本家绝对控制社会权力的社会形态,真正意义上的私人资本并没有控制社会的权力。长期以来“双轨制”的存在,政府直接参与市场活动,权力对社会资源的掌控,不仅造成商业权利弱势而公权力强势的现实,也使官商勾结成为必然。

谁也不知道,这是否就是链条的全貌。不过,这种由商界人士而至各路官员,由巨商而至高官的联系,显然已不再只是那种“萝卜”和“泥”的关系。

关于黄案,或许我们仍没有办法,得知黄光裕从一文不名到坐拥国美电器和北京鹏润地产两大大型企业,这种“传奇”的发达经历背后,有着怎样的权力运作。事实会议上表示,各级公安机关经侦系统执法工作电视电话会议上表示,各级公安机关经侦部门要严格按照法律政策界限,讲究执法方式方法,对负责企业正常经营的高管人员要慎用拘留、逮捕措施。在当时,他到底带着怎样一种复杂的心情发表“慎拘论”,是否曾梦想过“慎拘论”能够对黄光裕案施加影响?而在今年两会上,全国政协委员陈绍基正是新中国成立60周年之际实行特赦的建言者之一。或许他们的言论及建言当初听起来似乎没有问题,却经不起事后放到黄案背景下的联想。官商勾结是否已进入影响政策制定、以政策保障联盟利益的“高级阶段”?

黄光裕被拘押之后,去年12月24日新华社有一则报道:郑少东在全国公安机关经侦系统执法工作电视电话会议上表示,各级公安机关经侦部门要严格按照法律政策界限,讲究执法方式方法,对负责企业正常经营的高管人员要慎用拘留、逮捕措施。在当时,他到底带着怎样一种复杂的心情发表“慎拘论”,是否曾梦想过“慎拘论”能够对黄光裕案施加影响?而在今年两会上,全国政协委员陈绍基正是新中国成立60周年之际实行特赦的建言者之一。或许他们的言论及建言当初听起来似乎没有问题,却经不起事后放到黄案背景下的联想。官商勾结是否已进入影响政策制定、以政策保障联盟利益的“高级阶段”?

黄案抖出的猛料,一再地提醒我们,如何改革体制,约束权力,确立更健康的市场机制,保证更畅通的民意机制,依然是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 耕田

任志强何以一贯藐视公众智商

在今年的博鳌发言,任志强依旧发扬了其语不惊人死不休的风格。他这次挑战我们神经和智商的观点是:和工资收入相比,改革开放30年来房价等于没有涨。他的基本论证过程是这样的:1978年中国GDP大约3000多亿元,现在增长到30多万亿元,增加了100多倍;1978年全国职工月平均工资28.6元,现在也增加了100倍;而30年间的房价只增加了16.6倍,和工资收入相比,房子等于没有涨价。

任志强的这个论证,貌似很“相对论”,事实上根本禁不住一点经济常识的推敲。我建议任志强先去读读中国统计年鉴,再补习一下对收入进行年度比较的时候,必须扣除价格因素的这个统计学的最小儿戏的知识。我可以告诉任志强先生真正的计算结果,那就是扣除价格因素之后,中国的GDP30年来实际增长14倍,而城镇居民人

均收入增长9倍左右,农民收入增长6倍左右。那么,以这个真正的增长比例,和目前的房价比比,任志强先生还会这么自信说房价没有涨吗?

除了如上错误之外,任志强的话,只要我们仔细掂掂,不需要什么深奥的原理,至少还有两个常识性错误:首先,众所周知,1978年的时候,中国根本就没有商品房这个东西,我不知道任志强所说1978年的房价是怎么来的;其次,1978年的时候大家的收入其实差不多,用平均收入这个概念不会出现统计上的偏差,但30年后,中国的基尼系数数明白白告诉我们,中国已经成为世界上贫富差距较大的国家之一,用没有任何意义的平均收入说明房价,掩盖了房价增长远高于绝大多数人实际收入增长的事实。

任志强用貌似公正的数据来说话,而且,假定大家都是傻子,明修栈道,暗度陈仓,但根本禁不住专业和常识的推敲。比如,对于大家诟病的房价与收入比,他在博鳌的时候有一个论点认为,中国的房地产市场里有经济适用房等保障性住房,这些是国外没有的。他甚至说国外没有住房公积金,否则,我们的房价与收入比不会这么高。这仍然是他一贯的“只算加法,不算减法”,或者“只算加法,不算减法”的逻辑,而且,依然假定民众的智商很低。其实,现在很多老百姓也知道了,不要说新加坡、英国等住房保障非常完善的国家,即使在美国,保障性住房的比例依然高达整个房地产市场的70%以上。

这样一个说法没有多少逻辑,又有明显利益倾向的人占领房地产市场的话语权,出于各个场合,搞出很多闹剧一样的观点,的确反映了中国房地产市场的病态。 马光